



北洋

之始

〔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 著

朱艳辉 叶桂红 译

山東畫報出版社

北洋

之始

〔美〕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 著

朱艳辉 叶桂红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洋之始/(美)汤姆森著;朱艳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2

ISBN 978-7-80713-633-0

I. 北… II. ①汤…②朱… III. 北洋军阀史-史料
IV. K25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94509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乌 耕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规 格 165×230 毫米
23.5 印张 42 幅图 28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资料室联系调换。

出版说明

本书的作者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 (John Stuart Thomson, 1867-1950) 是一名美国传教士, 1909 年来中国传教。他的这部 *China Revolutionized* 写于 1912 年。此前在 1909 年, 曾著有《中国人》(*The Chinese*) 一书。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 作者身处中国, 深切感受到了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深刻变化, 并对此做了详尽的描述。同时, 他还对辛亥革命的整个历史进程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 其中将革命军事斗争分成左路、右路两条战线分别进行描写的部分尤为生动, 让人有种恍若置身其中之感。作者还以一个美国传教士的视角, 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当时的风云人物进行了品评, 其中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是我们平常很少触及的, 但却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些历史人物。此外, 作者还不惜笔墨地描写了一批对当时中国有着重大影响力的外国人, 比如曾经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罗伯特·赫德、裴式楷和安格联等人。

作为一名已在中国游历三年之久的外国人, 作者对中国社会的很多现象和习俗仍感到非常新奇和难以理解, 因此专门设了一章对这方面进行描写, 其中很多例子在我们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有趣。作者还通过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的工业、农业、林业、商业、财政、铁路、运输、公共工程、陆军、海军、教育、文学、语言、建筑、艺术、宗教、法律、气候、疾病、卫生、女性状况等各个方面。其中尤为可贵的是, 作为一名看到中国教育落后状况的西方人, 作者在那个时代就表达了教育高于一切, 提倡一切应以教育为本的理念。作者在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各国传教士和教会在推动中国新式教育和医学发展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 以及教会学校和医院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有些内容有对传教士歌功颂德之嫌, 但也并非全无依据。另外, 在讲述中

国的疾病和卫生方面时，作者表达了对鸦片贸易和罂粟种植的谴责，并对中国能够迅速根除鸦片吸食和罂粟种植大加赞赏。作者还专门用了两章的篇幅对当时中国的主要城市进行了详尽的描述，透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主要城市的。此外，本书还阐述了中国当时的内外政治、以及各国对中国的影响；严厉批判了日俄等国企图蚕食中国的狼子野心，并表达了作者认为英美等国对此应坚决予以制止的强烈愿望。另外，作者还通过本书对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进行了描述，甚至列出了当时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的市场价格，真可谓细致入微了。

总之，这是一本涵盖面极广，对于了解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极为有益的著作。尤其值得再次提起的是，它是一位美国传教士、是一个外国人对经过辛亥革命洗礼前后的中国的认识。其中有些内容和描述，今天我们看来或许会觉得可乐，但在可乐的同时，我们的内心能够平静吗？

本书根据 1914 年英国 T. WERNER LAURIE, LTD. 出版的 *China Revolutionized* 译出。

——译者

目 录

-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和历史 / 1
- 第二章 中国的智慧和幽默 / 68
- 第三章 中国的工业和商业 / 82
- 第四章 中国的财政和预算 / 98
- 第五章 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商方法 / 109
- 第六章 中国的铁路 / 117
- 第七章 中国的船运和水路 / 123
- 第八章 美国在中国 / 130
- 第九章 中国的人物 / 142
- 第十章 中国的国际政治 / 146
- 第十一章 中国的内部政治 / 156
- 第十二章 中国的公共工程 / 160
- 第十三章 日本的影响 / 165
- 第十四章 俄国和法国对中国的压迫 / 177
- 第十五章 在中国的外国人物和他们的影响 / 182
- 第十六章 满 人 / 192
- 第十七章 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 201
- 第十八章 中国的新式教育 / 211
- 第十九章 中国的文学和语言 / 223
- 第二十章 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 / 230
- 第二十一章 外国在中国的殖民城市 / 239

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城市	/ 275
第二十三章	中国的宗教和传教	/ 287
第二十四章	中国的法律	/ 299
第二十五章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 307
第二十六章	气候、疾病和卫生	/ 317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女性现状	/ 329
第二十八章	中国的农业和林业	/ 339
第二十九章	中国的建筑和艺术	/ 344
第三十章	中国的社会学	/ 354
第三十一章	美国对中国的兴趣	/ 361

第一章 革命的起源和历程

(从1911年10月10日至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

在最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这是难以想象的，但它出现了。这就要求黄种人要像白种人一样思考，而这从未有过，即使是在之前的日本也未曾有过。这意味着中国要与广阔的世界展开自由的交流，而他们四百年来一直都顽固地拒绝迈出这一步。这意味着世界上最骄傲、最独立的民族现在必须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绵延四千年的历史和骄傲将随风而去，他们需要谦卑地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再只有一个皇帝，四亿人每个人都是皇帝，你要问每个人：“皇上，您想怎么样呢？”长达两千年的教育体制在这一刻成为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父亲）这一延续了至少五千年的信仰，就像酒、米和儒家教条一样即将成为微不足道的过去！四亿人将担负起个人和民族的责任，他们将进入世界的舞台并对世界产生影响，当然其中不乏荣誉，但也有耻辱！他们要拥有对事情对错与否的发言权，他们要放弃父亲、自身和儿子这个根深蒂固的三位一体概念，转而在有限的时间里展现崭新的自我。这是一场浩大的运动，这片土地有整个欧洲那般辽阔，人口相当于白人的总和！一直都只对祖先崇拜和神话弯腰的四亿人，现在要推开一直以来紧闭着的通向科学和医学的大门，这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这场运动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整个人类而言都可能孕育着巨大的福祉。这艘巨船起锚所掀起的浪潮，可能会让欧洲和美国这两艘已经起航的轮船更进一步，并给它以更多的推动力，虽然暂时似乎还只是一种威胁。整个世界的商业、制造业、劳动力、金融、税务、知识、农业、艺术、甚至宗教都要重组。人们要开始说和写一种世界上最难的语言，而这也要求英语必须再次战胜这种强大的陌生语言，否则只有灭亡。这也要求圣经必须用真理占领这片土地，否则只有退出并丢掉一半的世

界。忽必烈、铁木尔以及金帐汗军可汗这些黄种人的灵魂可能再次现身，欧洲人该如何回答德皇威廉二世的“黄祸”问题？这位德国皇帝曾经画过一幅《黄祸图》，画中欧洲所有的民族团结到一起对抗东方的入侵，保护自己的信仰和文明。在这样一个革命党人与朝廷激烈交锋的国家里，初来乍到的外国人能够得到保护吗？新的领导体系能够建立吗？或者曾经辉煌一时的蒙古人会再次爆发出巨大能量吗？既然满人的统治突然轰然倒地，中国以后的路会怎么走？中国能够统一而不至于南北分裂吗？岌岌可危的皇权会如何选择？毕竟哈布斯堡王朝、萨伏伊王朝、霍亨索伦王室、奥斯曼王朝和日本天皇等等皇朝一向都在宣称“天授皇权”，这与英国的“立宪权利”可完全不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已经发出了“天命无常”的挑战。

在中国革命者向世界宣布他们要建立共和国的时候，让整个世界震惊的同时，上面这些问题也摆在了世人面前。中国要建立的是共和政体——而不是君主政体，甚至那些在日本接受教育的中国人都这么说，而日本还远没有如此进步。就在最近，一位曾经留学美国的日本编辑和其他几个人，被日本政府秘密审讯并处决，他们的报社也被查封。新的共和国需要不折不扣的新闻自由。如果不是美国竭尽全力帮助中国消灭鸦片，并且英国在1909年到1911年间慷慨牺牲了自己的收入来源，中国1911年的革命可能不会爆发。改革让困惑的中国人开始清醒，让一百万人心情澎湃并加入了改革队伍，近一亿美元被直接或间接用于刺激改革。美国和英国通过1909年在上海举行的万国禁烟大会，让中国步入了正确的轨道。

1911年10月的伟大革命，并非万里晴空中突然而至的电闪雷鸣。乌云一直在凝聚，虽然国内国外很多人都没有或者不愿意看到这一点。1911年9月，两广总督张鸣岐，派密探沿新落成的粤港铁路搜捕军火走私。同月，广州的清军突然包围《天民报》报社，并逮捕了几名改革派人士。1911年9月，广西提督陆荣廷坐炮舰顺西江抵达广州，从广州兵工厂带回机枪和弹药，以对付一直被满清政府称作“无政府主义者”的改革派人士。就在上个月，北京的邮传部就已经开始禁止使用私用密码，并严格审查改革派人士之间的互传信息。暗地里支持改革派的几名总督，早在1911年8月就通过炮舰上的秘密电话通知舰队撤离即将爆发革命的长江流域，他们还建议派遣在纽约都非常知名的“海圻”号巡洋舰去斯皮特黑德参加英王乔治五世的加

冕庆典。甚至远在1907年7月，满清政府就已经开始作出反应，他们秘密监控运送到中国南方的武器。有趣的是，这些武器都是伪装成管道、冷凝器、铁块、陶瓷等货物运送到香港的。1906年12月，在西江沿岸的广西省梧州市，中产阶级文人剪掉辫子，穿上卡其布军服，并进行了操练和田径锻炼，亦即他们早在五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艰苦的准备；在1909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的温上校的领导下，他们在汉口战役中冲在了第一线。1911年8月，汇丰银行报告说在其发行的九百万美元金券中，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广东和其他南方省份的中国人手中，而未能流通。这样囤积安全证券，说明人们对商业和政治前景缺乏信心。

1911年8月，邮传部命令铁路大臣满人端方去西化严重的新城镇广州“安抚当地百姓”，端方却以“广州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为由拒绝前往。同月，摄政的醇亲王只得要求庆亲王举荐另一名官员去广东镇压叛乱，当时的间谍活动已经很常见，有时新上任的官员还没到，冒充的人就已经到衙门了。1911年8月，为了杜绝这种官员被冒充的现象，北京的内阁决定把新上任官员的照片封在信封里发到各地。

从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归来的中国人，无法忍受古老城市的束缚，他们选中了澳门内港上游十英里的地方，开始筑造防波堤和疏浚工程，以建造一个海港。宽阔的街道，整齐的排水沟，漂亮的店铺，寺院，警察局，消防局和消防设施，自来水厂，图书馆，公园，绿地，商业局，电车轨道，电力和燃气，医院，学校，戏院，带花园的房子，汽艇和蒸汽机工作线，还有一个自由的港口，——一切都规划好了。当一个政府允许食物行业的垄断，那么暴乱也就不远了，因为那样将不再有任何公平可言。历史也证明这样的政府必将倒台，比如1906年7月红帮（红色帮派）领导的杭州抢米骚动和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好在地处被1911年革命大浪席卷的长沙市区的雅礼学堂幸运地避过了这场大火。1906年新式学堂开始使用新课本，这些课本里的中国不再是古老悠久的中华强国，而是所有列强都想咬上一口的美味，其目的自然是试图唤醒这个古老民族沉睡的爱国情怀。很多学生日后都加入了革命军最勇敢的两支队伍，敢死队和“投弹队”。1911年4月，在广州发动起义的起义军向世界发布了一份声明，与孙中山总统和伍廷芳外交总长在1912年1月宣告的声明几乎完全一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 驱逐满清。
2. 与外国人友好交往并保护他们和他们的在华财产。
3. 与各国缔结的条约当时有效的继续有效。
4. 承认清政府过去的外债和赔款。
5. 列强的各项特权继续有效。

起义军进行了拼死战斗，如果当时他们能得到足够的饷械补给，中华民国早在4月就能在广州建立，而无须等到11月的武昌和南京。美国炮舰“威尔明顿”号和英国炮舰，开至广州沙面岛保护外国人。后来在1911年10月革命中被杀的李将军，几乎无力镇压这次在广东和福建爆发的起义。多个世纪以来，汉人女性都不会与她们称为“帐篷女人”的满族女性有任何关联，跨过突厥斯坦，汉人把自己与蒙古人隔离了开来，但后来满人征服中原之后终于取代了汉人。

在革命爆发前数月，几乎所有的传教团就已经从学生或朋友那里知道，中国将会发生严重而持久的动乱。中国人认为个人主义已经在英国和美国壮大并开始对抗特权主义，个人主义最后也会在中国出现，并且这次起义声讨了道家的无为、佛家的出世和儒家的恭顺。心中充满理想的中国人，在看到了一线希望之后是这样说的：“我不属于任何团体，我只属于我自己。”美国外交使团并非完全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或者没有任何准备，在革命开始的第一个月里，美国舰队是中国水域上最大的外国舰队，舰队司令默多克召集了“萨拉托加”号（改装自西班牙战争中的“纽约”号）、“奥尔巴尼”号、“新奥尔良”号和“威尔明顿”号巡洋舰，“海伦娜”号、“艾卡诺”号、“维拉波斯”号和“萨马”号炮舰，还有“蒙特里”号海防战舰以及“巴里”号和“迪凯特”号驱逐舰。

早在1910年6月3日，革命爆发前一年零四个月，上海《新闻报》就登出了这样一条消息：“所有公使馆和领事馆都收到了上海友好革命人士的匿名信，警告他们一次大规模的反封建王朝的起义即将到来。只要他们不支持满清政府，就不会受到伤害。”1911年8月，西部的甘肃省西宁市爆发起义，所有店铺的棉布被洗劫一空用来制作军服，一个十五岁的男孩被尊为领袖，他还被赋予了一个非常响亮的称号——“救世王”。在发生水灾的长江流域，富人囤积粮食，1911年8月沿长江流域爆发了

抢米骚乱。1911年8月23日，起义群众登上停泊在广州附近西江上的一艘炮舰，枪杀了炮舰指挥官并夺取了武器和弹药。9月1日，清海军部加强了对广东水域的巡逻以打击武器私运，而陆军部则要求矿商在获得许可后方可进口炸药，因为他们实在害怕“无政府主义者”会进口炸药。1910—1911年间，长江盆地、淮河地区和大运河地区发生的水灾和饥荒，使清政府受到了尖刻的指责，因为它未能有效缓解灾情，饥民都愿意战斗，因为军队里至少有饭吃。“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逃到亚杜兰洞。”上海的报纸，包括资格最老的改革报《申报》，都提到了满清政府官员滥用酷刑，我在本书“中国的法律”一章中引用了这些报纸的记载。

锡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革命种子的传播，四十万中国锡产商和海峡殖民地新加坡与槟榔屿的矿商所起的作用最大。紧随他们的，是十万美籍华人和五万澳籍华人。早在1898年，李鸿章就曾在广州断言，外国新式教育的传播很有可能会颠覆清朝；而他作为一个出身安徽合肥的中国人，在四十五年宦官生涯中是所有总督中最坚定的满清王朝支持者。迷信是一直持续的，而哈雷彗星又在天空划过。恺撒被暗杀时，耶路撒冷城陷落时，意大利被阿提拉侵入时，英王哈罗德被入侵的威廉打败时，罗马在英格兰遭受失败时，魁北克被沃尔夫攻陷时，它都曾出现过。现在，它可怕的光芒注定是在预示清朝的灭亡。据说还出现了其他征兆：河南下了红色的雪（雪和黄土），杭州的潮水涨高了二十英尺，冲决堤坝并冲进了海宁塔的回廊。这些都预示着朝代的兴替，因为这样的先例历史上俯拾即是。

与其他很多国家一样，满清的官员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统治者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拿着很高的俸禄同时却又贪婪成性。革命爆发的前一年，土地税总收入达到1亿5000万美元，但却只有3000万纳入国库。汉人认为满人应该为这样严重的失职负责，因为至少应该有1亿归入中央和省级国库。而即使这样，也意味着至少有5000万要被那些认为“当官就该谋私”的官员中饱私囊。1911年9月，革命爆发前一个月，北京当地报纸《奇闻报》报道说，所有工人都拿不到工钱，茶工甚至在督察官员家门上贴匿名信，上面写道：“我们的工钱连个影子都看不到。为什么？！”朝廷对长期受灾的广东严加课税，高州的砖窑，南海的丝绸作坊和茶楼，甚至寺庙都要“缴纳所有的税种”。下面，我以一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反抗事件为例：

1911年9月6日，广州石龙一所寺庙的僧人组织来庙里上香的人进行了反抗，他们捣毁衙门、酿酒厂、屠宰场和鱼市场。甚至早在1898年，光绪皇帝就曾颁布法令，要求广州的彩票销售收入要负担京师大学堂三分之一的修缮费用。我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一章中提到，1911年8月广州附近的新会，在一座叫做牛湾桂林寺的寺庙里竖有一座很奇特的雕像——它是跪着的，前去上香的人都会用鞭子抽打它，以此警示后人：这就是投靠朝廷铁路和税收政策之人的下场！北京和广东之间总是充满敌意，北京的满人官员被调往广州任职时，总会相互开玩笑说：“好了，我要去管那些苗子（野蛮人）了。”而实际上，优雅而且极具商业头脑的广州人显然不是苗子，而这种盛气凌人无疑是非常招人厌恶的。

无能的满清政府不断向外国人开放特权，而且在收回或赎回这些特权时，由于中部和南部各省人民过度的爱国行为，外国人除了收取费用和利息之外，还要收取大量的特权费，这些都让人民怨声载道。我无法举出具体的例子，因为我在这里要谴责的是一个制度，而不是某一个人。如果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去考虑，便知他们言之有理，他们不该为收回本属于自己的权利而支付大量的金钱，但是很多时候，堕落而无能的统治集团却通过强制或欺瞒大众而铸成此类事实，而且他们从来不会征求相关各省的意见，于是“缴税却没有代表权”的情况仍在继续。这并不是他们想拒不清偿借款，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借到任何钱。“赔款”和“外债”成为中国人最痛恨的两个词，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建设一直庞大的海军，装备精良的武器，也按照西方国家现在向他们解释这两个词的方式向西方解释一下，它们其实不过是“侵犯”和“掠夺”的代名词。自从1898年德国垄断了富庶的山东省的采矿和铁路权之后，民间的不满就从未停止过。

在铁路和特权问题上，不禁让人想起美国将军J. H. 威尔逊在他的《中国（1887）》一书中的评论：“中国很快会建造铁路、开采矿藏，只要他们发现自己有财力做这些。他们最初可以通过私人认股的方式，使用自己的劳力，并且可以接受公正和真诚的外国专家的指导。他们至少目前不会把这个权利交给外国人，他们甚至不会通过抵押的方式向任何外国财团借款。”民间的不满还远不止如此，他们认为268年前的明朝给清朝留下了很好的基础，公共设施、桥梁、道路、寺庙、宝塔、运



著名的袁世凯，1913年1月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是中国中部河南省人。他在照片中穿的是统领北方军队的大元帅军服。他在中国是一位非常强势的人物。

河等等都非常齐全，而且他们还非常不满清朝政府征收大量税收却从来不修缮一座寺庙、一条运河或者道路，所以中国现在才会如此落后。民间的不满还指向朝廷的造船厂，包括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因为它们都在为载洵和其他朝廷贵族制造奢华的汽艇，而不顾朝廷根本无力承担如此奢侈的花费。

1911年10月10日革命爆发两年前，笔者就在《中国人》一书中认为领导中国变革的有五个人：孙中山，作为反对满清统治的起义者，愿意拿起武器建立一个共和国家；康有为，愿意进行改革，但是希望在严格君主立宪的基础上保留清朝的统治；梁启超，翻译了大量关于改革的书籍，也是改革后新国家最可能的部长；伍廷芳，内心深处也是一个改革派，他会选择“同情的关注”；袁世凯，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西化的乐观主义者，最受北京和天津的外国人欢迎，虽然不受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信任。革命在1911年11月达到高潮，孙中山即将成为众人翘首以待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康有为处在该在的位置上；梁启超成为袁世凯第一个君主立宪内阁的司法大臣；伍廷芳担任了上海临时共和政府的外交总长；袁世凯在河南彰德赋闲两年之后，出山成为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的总理大臣。

1911年10月10日，伟大的革命就像是万里晴空中突然而至的电闪雷鸣，发生在中华大地的中部——长江流经的武昌，就在美国炮舰“海伦娜”号和“维拉波斯”号的枪口之下。就像我一直都在强调的，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事件，他们在纲领和领袖的带领下在国内外进行宣传，他们宣传的观点可能无法很快一一变为现实，但他们的确播下了爱国革新的种子。作为最早的、也是第一个改革倡导者，康有为在1897年用他的著述打动了光绪皇帝。但是光绪皇帝在1898年被慈禧太后囚禁之后，在广东出生并在香港接受教育的康有为逃到了英属新加坡和槟榔屿，并在这里开始准备一边游历一边宣传“保皇会”（又称中国维新会），开始沉思革命和改革，但暂时还是坚持应该以君主立宪的形式保留清廷。保皇会与孙中山力主共和的哥老会、兴中会和同盟会（改革和革命团体）完全不同。换言之，康有为是一个属于塔夫脱类型的、“保守的”中庸改革派，而孙中山则是一个属于罗斯福型的、彻彻底底的改革派。康有为成立的团体在中国、美国和英国都有所发展，康有为前去视察，被操练的士兵攻击为反对改革的翰林院文人。

梁启超，一位作家和翻译家，先到海峡殖民地，之后去了日本的神户和横滨，他在这里编辑了改革报纸《西报》和《明报》，将英美文学界的很多作品翻译并介绍到国内，他也认为应该暂时保留满清朝廷。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麦克林博士，将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穷》翻译为中文，这本书得到了改革派人士的认同，尤其得到了孙中山的推崇。位于上海河南路的张元济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从1898年开始为中国学堂翻译西方课本，每年的翻译量达到一百万美元。位于苏州和上海北京路18号的美华书馆，美国圣公会书馆，还有其他美国和英国传教团及教会组织，多年来一直在散发宣传真理的中文小册子。在香港受雇于外国公司的富有买办，为各爱国团体捐赠了一千美元。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海蒙在与父亲克瑞翁国王之间的争执中，明确指出绝对的统治只适用于统治沙漠，那些接受过外国教育的学生也引用了这一点。

袁世凯在1909年被摄政王载沣免职，但自从赋闲于河南彰德开始，他就与新形成的思想和军事力量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与自己的后盾、中国北方的外国人保持了很好的联系。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有势力的人，颇具他的老师李鸿章的风范，而李鸿章是被西方世界所熟知的。1909年以前，在天津，由于得到了外国人的帮助和西方国家的指导，袁世凯控制着国内最好的军队和最好的学校，甚至最好的工厂。然而，有些改革派人士根据袁世凯的过去，把他看作是一个善于把握时势的政客，一个依靠外国势力的机会主义者和独裁者，他太西化，与“恢复中华”和“同盟会”（革命团体）的精神格格不入。他们把他的过去看作是一个被满化的汉人，自己不敢公开力主共和，而必须有人带领他。他可能像黎塞留那样出色，但却无法像华盛顿那样伟大。他们认为他虽然可能已经想好了，但他的内心可能还没那么强大，如果不对他加以限制，他会向外国人做出太多的让步。他们还不禁打开有关1897—1898年的痛苦回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袁世凯变节，改革早已能够和平地在全国推广。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青岛和其他北方港口的外国人中间，袁世凯是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他与中国西部、中部和南部的改革中心，以及这些地区通商口岸的外国人都没有多少联系，而且他与英国殖民地香港的中国华侨也没有多少联系，但正是香港和上海的华侨在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袁世凯唯一真正意义上的出国经历，

是他年轻时随军入朝鲜的十二年。袁世凯性情冷静，南方曾有著名的报道说：“面对这样一个冷静而城府又如此之深的人，你还能有什么要求呢？”在1884年朝鲜反抗日本侵略的战斗中，据说袁世凯曾经拒绝红十字会对士兵的救治，开玩笑说不需要麻烦医生了，因为“他们虽能让人恢复如初，却无法让士兵恢复如初。”在那次和其他很多战役中，袁世凯都显得非常冷酷，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袁世凯将来真的能够为一个统一的中华民国鞠躬尽瘁，那么他过去所犯的错误必将在巨大的荣誉中被人们淡忘。

孙中山身上打着香港的印记，他从一开始便力主革命和建立共和政体。孙中山幼小就听叔叔讲述太平天国起义中激动人心的故事，他的叔叔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曾担任军官。他1866年出生于广州以西七英里的佛山，1884—1887年间，在广州得到了英美传教团的克尔医生的帮助，学习了西医和英语。后来又在香港跟随康德黎医生学习外科医学，在这里成为香港公民（也是英国公民），当然现在他已经又改回了中国国籍。康德黎医生当时在香港西医书院教书，该校现已并入香港大学。1892年，孙中山成为第一个在澳门行医的中国医生，这当然遭到了葡萄牙医生的强烈反对，他因此不得已在1894年回到广州。他的父亲是一位基督福音传道者，是公理教会（伦敦传教团）教友，而孙中山把学习基督圣经看作是中国教育最必要的一步。康有为在北京开展活动两年前，孙中山就已经在1895年偷运武器到广州，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并经受了第一次战火的考验。在此次起义和之后的历次起义中，他都显示出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孙中山在檀香山和哥哥及一些朋友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夏威夷和美国学习期间产生了共和信念。由于汕头的起义人未能与香港的起义人在广州碰上头，孙中山的计划在1895年失败。在香港著名律师丹尼斯先生的建议下，孙中山逃到了日本神户，后来又辗转到了檀香山和旧金山。这个身高只有五英尺五英寸而长相俊朗的小个子，穿着打扮非常像英美人，多年来一直隐姓埋名往返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组织“哥老会”（改革团体）队伍的操练、教育和经费，人员和财力主要输送到了广州、上海和1911年10月10日革命的爆发地武昌。黄兴是孙中山在国内的代言人，由他代表接收这些援助。在这些经费的使用上，孙中山的助手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值得他信任，但有一个人除外，对此孙中山本人曾经写道：“他会